

修辞：符号意指的构建方式*

李 玮

摘 要：本文研究修辞手法如何助力符号意指的构建这一问题。针对该问题，巴尔特的阐述“修辞学则是涵指项的形式”过于概括，费斯克的认识“隐含意是以隐喻的方式发生作用”不够完备，隋岩的理解“元语言是换喻的对应合谋”有失准确。为了弥补观察到的不足，本文提出：第一，隐喻、转喻、反讽修辞手段分别以相似性原则、相关性原则与反衬性原则这些理据性联结方式，助力含蓄意指的建构；第二，作为“操作程序”的元语言，是含蓄意指得以构建的内在驱动力；第三，以大规模、重复性和规约性使用为特征的象征修辞，使含蓄意指得以向神话的方向沉淀和升华。

关键词：隐喻 转喻 反讽 象征 含蓄意指 元语言 神话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66

一、问题的背景：四种意指方式的渐进式提出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提出，符号（sign）是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组成。其中，“能指”也被称为符号的能喻（vehicle），指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是符号的形式面；“所指”指我们在感知“能指”时所唤起的心理概念，是符号的内容面。相对索绪尔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产物”称为“符号”而言，巴尔特将能指与所指联结成一体的过程和行为称为“意指”（signification，又译为“意指作用”“意指方式”）。意指探讨符号意义的生成，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可以意味的东西和被意味的东西的结合体；既不是形式也不是内容，而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

*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舆论编码的符号机制与策略研究”（14CXW027）、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的符号学机制与策略研究”（2014K10）、2013年度西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人文社科类）“新闻编码的符号策略研究”（13NW22）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符号“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方式，也即意指方式，叶尔姆斯列夫率先提出有三种符号学：其中，表达层面（能指）与内容层面（所指）结合起来的，是直接意指符号学（denotative semiotics）；若一种符号学，其表达层面（能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含蓄意指^①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s）；若一种符号学，其内容层面（所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称为元语言符号学（meta semiotics）。^②

巴尔特对叶尔姆斯列夫的三种符号意指方式作了更细致的阐述：“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表达式 ERC。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 ERC 系统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此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延伸。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两个密切相连但又彼此脱离的意指系统。但是两个系统的‘脱离’可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取决于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的方式，这样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整体，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一系统（ERC）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或者表示为（ERC）RC。这就是叶尔姆斯列夫称作的涵指符号学。……按照第二种分离的（对立的）方式，第一系统（ERC）不像在涵指中似的成为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内容平面或第二系统的所指……或表示为 ER（ERC），一切元语言都属此类。”^③ 用图示来表示这三种意指方式，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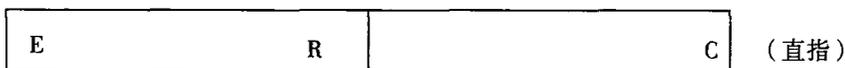


图1 直指/直接意指（denotation）：ERC

其中，直指是最初级、最简单、最自然化的符号意指方式。它只有一级符号系统，符号表意只在一个层次内进行；它直显真实，主要指向符号的外延与对象，而不涉及符号的内涵与意味。因此，直指所产生的意义，可称为“明示意”。

^① 不同文献中对此概念的使用不统一，有“含蓄意指”“涵指”“隐含意”“内涵”几个不同版本，而碍于文献原文引述的限制，本文也没有作统一。与此相应的，文中的“直接意指”也等同于“直指”，“神话”等同于“迷思”。特此说明。

^② L.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F. J. Whitfield, tran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p. 115. 转引自屠友祥：《罗兰·巴尔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式》，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69页。

E2	R2	C2	(涵指平面)
E1	R1	C1	(直指平面)

图2 涵指/含蓄意指 (connotation): (E1R1C1) R2C2

E2	R2	C2	(元语言平面)	
	E1	R1	C1	(直指平面)

图3 元语言 (meta-language): E2R2 (E1R1C1)

涵指和元语言,是在直指的基础上生发出的二级符号意指系统。在涵指中,第一系统的直指(即被结合的能指与所指)构成了其能指平面或者说表达面,被称为“涵指项”(connotateurs),第二系统构成了涵指平面。相对直指的“明示意”,涵指所指向的意义被称为“隐含意”。

与涵指是侧重于表达层面的描述相对,元语言是侧重于内容层面的描述。对元语言,巴尔特引用叶尔姆斯列夫的话来说明:“如果说一种操作程序是建立于无矛盾性(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等经验原则之上的,那么科学符号学或元语言就是一种操作程序……当在其被直指状态的分节语言充作一个意指对象的系统时,它是在‘操作程序’中被构成的,即在元语言中被构成的。”^①

然而,巴尔特对意指方式的阐述并没有止于叶尔姆斯列夫的框架。他对涵指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延展,提出更为复杂的“神话”意指系统。这里的“神话”,“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故事神话,而是指被建构来为文本读者或观众传送特别信息的关于人群、产品、地点和思想的思考方法”^②,是根据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符号学链而建立的,借助于涵指的二级符号学来操作的次生符号学系统。它包含着两种符号学系统:位于第一层级的是语言系统,位于第二层级的是神话系统。^③

①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② 乔纳森·比格内尔:《传媒符号学》,白冰、黄立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③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E3		R3	C3	(神话平面)
E2	R2	C2		(涵指平面)
E1	R1	C1		(直指平面)

图4 神话/迷思 (myths): [(E1R1C1) R2C2] R3C3

四种符号意指方式的划分, 实则是关注了符号意指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结果。其中, 直指在第一个层次上进行; 涵指和元语言在第二个层次上进行; 神话在第三个层次上运行。三个层次之间, 尤其是从直指到涵指再到神话, 层层递进, 后者涵盖前者, 前者孕育后者。符号意指过程, 在揭示了符号如何从自然世界衍义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世界的同时, 也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符号得以自然化的。

二、研究问题与前人论述: 符号意指与修辞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如上所述, 符号意指是从符号指向对象与意义的过程与行为, 不同的符号意指方式意味着意指过程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那么, 问题来了: 这些不同符号意指方式是如何得以进行其意义指向的? 符号意指依靠什么方式和手段来完成其意指? 符号意指与修辞手法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对这些问题, 巴尔特通过剖析涵指内在构成的方式, 率先揭示了涵指与修辞、意识形态的关系。他阐述道, 对于涵指的能指来说, 一个单一的涵指项可以由多种直接意指符号结合起来形成, 而只构成一个单一的涵指之所指。但是, 不管涵指以什么方式“附加”于直接意指的信息上, 直接意指也总是存在没被吸尽之信息, 直接意指的能指总是存在, 因而, 涵指项最终总是呈现为一系列不连续的、不规则的符号, 而这些符号又被构成它们的直接意指的信息给自然化了。关于涵指的所指, 巴尔特说, 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是“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 其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恒常量就是意识形态, 具有一般性、完整性和弥散性, “这些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相关, 可以说, 正是因此之故, 外在世界才渗入记号系统”。简言之, 在巴尔特看来, 涵指与修辞、意识形态的关系可描述为: “意识形态就是涵指的所指的形式(在叶尔姆斯列夫的意义), 而修辞学则是涵指项的形式。”^①

①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70页。

约翰·费斯克认为，巴尔特对修辞如何助力意指的阐述不如他有关涵指和神话的思想发展得系统，因此也不太令人满意。于是，费斯克采纳了雅各布森和霍尔的观点，认为隐喻和转喻两个概念“确定了讯息发挥其指称功能的根本方式”，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符号意指。基于此，他论述了隐喻与转喻两种修辞手法之于意指方式的作用：“转喻通过相邻派生以达到写实效果，而隐喻则通过词汇变化以达到想象或者超现实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含意是以隐喻的方式发生作用。”^①此外，费斯克还认为，像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规约性符号三种符号的内部意指过程，分别对应着隐喻、转喻和象征三者修辞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隋岩则立足于“含蓄意指、元语言如何产生使人相信的传播效果，它们的深层机制是怎么运行的”等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含蓄意指、元语言、神话意指方式与隐喻和换喻（也即转喻）修辞手法之间的关系。^②他在质疑雅各布森的“棚屋与贫穷是换喻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如果存在关系的话，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相似或相悖，也即符号的暗含义（connotation）之间相似或相悖；二是符号的所指事物之间有逻辑联系，也即彼此之间虽然意义上既不相似也不相悖，但却有某种联系，存在某种相关性，也即雅各布逊所谓的毗连性……第二种情况是换喻……第一种情况就是隐喻。”^③鉴于此，他得出结论，含蓄意指与元语言就是隐喻和换喻两种话语轴向的等值对应。

前述学者对意指方式与修辞手法之间的关系阐述可充分说明，符号意指与修辞之间具有深度关联。这里，除了费斯克用简短的笔墨探讨过单个符号内的意指方式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像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规约性符号与隐喻、转喻、象征之间的逐一对应）之外，更多人将注意力用到了符号组合（文本）的意指方式与修辞使用之间的关系。只是，关于符号组合间意指方式与不同修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巴尔特阐述得过于概括；费斯克有所涉及但阐述得不够完备；隋岩虽直接针对意指方式与修辞手法进行了明晰的对应与区分，但却有失准确。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重新梳理符号组合间的涵指、

① 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② 参见隋岩：《符号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59页；隋岩：《含蓄意指与隐喻的等值对应——符号传播意义的深层机制之一》，载于《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隋岩：《元语言与换喻的对应合谋——符号传播意义的深层机制之一》，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隋岩：《含蓄意指与隐喻的等值对应——符号传播意义的深层机制之一》，载于《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元语言、神话几种意指方式与隐喻、转喻、反讽、象征等修辞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隐喻、转喻与反讽：理据性联结助力含蓄意指的构建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界定，含蓄意指的能指由直接意指组成。根据巴爾特的阐述，在含蓄意指这个二级符号意指系统中，通常“能指并不因为找到了所指而停止了意指活动，而是与所指一起向一个更大、更新的符号的构成因素——能指转化，使第二性符号系统能从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新的意义”^①，这种新的暗含义，也即常说的“内涵”。在其中，“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分层，实际上是赋予了直接意指第一义的权威，‘视直接意指基于真实、客观与法则’，凭借句子形式，使之呈现为‘简朴、如实、原初之物的状貌，亦即真实之物的状貌’”^②。

那么，含蓄意指建构意义的方式，真的如费斯克所言那样：“隐含意是以隐喻的方式在发生作用”，或者说，仅仅“以隐喻的方式在发生作用”？又真的如隋岩所言那样：“含蓄意指和元语言就是隐喻与转喻两种话语轴向的等值对应”？本文认为，费斯克说得不够完备，隋岩又有失准确。作此判断的原因有：第一，如果真如隋岩说的那样，含蓄意指等值于隐喻，元语言对应于转喻，那么，叶尔姆斯列夫和巴尔特何必要“大费周章”地再造一套术语来表达同一些意思，直接用隐喻和转喻，不是更直接有效？第二，按照隋岩对“元语言”E2R2(E1R1C1)的理解，E2R2C2是直接意指系统，E1R1C1是元语言系统，这与巴爾特的界定刚好相反，也不符合于叶尔姆斯列夫对“元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的阐述。第三，隋岩文章中的“神话”是含蓄意指与元语言再组合到一起的结果^③，这不符合巴爾特的界定——神话是含蓄意指系统的再次衍生。

在本文看来，含蓄意指构建意义的修辞方式，不仅有隐喻，更有转喻、反讽。只是，这三种修辞建构符号两造语义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不一样：隐喻和转喻分别依赖相似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来建立起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异

① 李华、刘立华：《罗兰·巴特符号学视角下的符号意指过程研究》，载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屠友祥：《罗兰·巴尔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式》，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 隋岩：《含蓄意指与隐喻的等值对应——符号传播意义的深层机制之一》，载于《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同涵接关系；反讽则主要依赖反衬性原则来建立起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排斥冲突关系。但是，无论是依赖相似性原则、相关性原则，还是反衬性原则来构建含蓄意指，“元语言”都是其意义构建得以实现的内在驱动力。

（一）隐喻：相似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依赖相似性原则建立两者之间语义的联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隐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也依赖相似性原则来进行语义的缝合。这种相似，不仅包括了物理意义上的形状相似、功能相似，还囊括文化意义上的心理相似。其中，形状相似是可以直接通过肉眼感知的，功能相似则是从功能角度出发而想象出来的，心理的相似则需要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

正如费斯克之“隐含意是事物之间特质想象性的移植”“隐含意是以隐喻的方式在发生作用”，隋岩之“含蓄意指就是借由隐喻得以构建的，隐喻就是含蓄意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阐述的那样，隐喻的这种相似性原则，的确为含蓄意指的意义构建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比如，在用“玫瑰”隐喻“爱情”的经典范例中，可以看到这种本体与喻体之间、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之间的相似性：作为一种植物的玫瑰，美丽、沁人心脾、令人向往，但有刺，不小心会伤人；而作为一种感情的爱情，同样美丽、沁人心脾、令人向往，也同样的有刺，不小心就会伤人伤己。正是因为两者间存在这样一种高度的相似性，人们才常用玫瑰隐喻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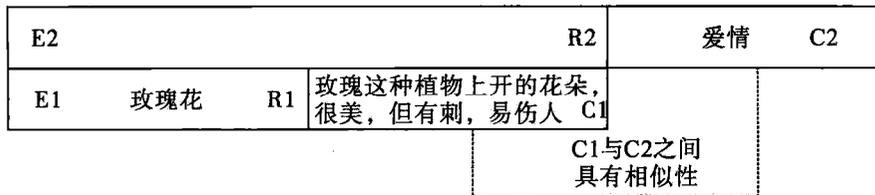


图5 隐喻依赖相似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二）转喻：相关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传统研究中的转喻，常被视为词语之间的相互借代——一种借用与本体事物有着特定现实联系的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本体事物的修辞手法。但认知语言学却认为，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段，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转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人们以同一认知域中具有较高显著度的A事物来借代、指向、激活B事物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A事物与B事物之间，总是存在某

种相关关系，要么是物理上的邻接关系，要么是心理上的因果关系。

作为一种常用思维方式的转喻，依赖其相关性原则，在含蓄意指中的意义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费斯克曾说过，作为含蓄意指次生符号学系统的神话，可通过转喻而得以建构：“迷思可以以转喻的方式，在一个符号（比如一个快乐的英国警察）中运行，以激发我们建构出一个迷思的一系列概念中的其余部分，就如同一个转喻激发我们建构全部事实的一个部分一样。”^① 乔纳森·比格内尔也曾明确表达：“媒介文本通常将一种所指思想与另一所指思想联系起来，或者将一个能指和另一能指联系起来以为人和物附加内涵，赋予其神话意义。这联想以两种方式产生作用，一是‘隐喻’(metaphor)，即使一个所指和另一个不同所指显得相似；另一种是‘转喻’(metonymy)，即用一个所指代替另一相关的所指。”^②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香则以“转喻像似性”这一现象的存在来告诉我们，与隐喻一样，转喻也可以依赖其邻接性原则参与到含蓄意指的意义构建过程之中。^③

比如，“水门事件”本身是指发生在美国“水门大厦”里的一件政治窃听与偷拍事件，却因为其丑闻属性，而使得“门”字被赋予了“丑闻”的深层含义，由此产生了诸如“质量门”“艳照门”“拉链门”“日记门”等意味深长的用法。很明显，这是典型的在相关性移植基础上构建含蓄意指。再如，雅各布森例子中的“棚屋”之所以成为“贫穷”的能指，隋岩例子中的“电视荧屏上的超女李宇春”之所以能成为“一夜成名”的符号能指，都是因为某种相关性、邻接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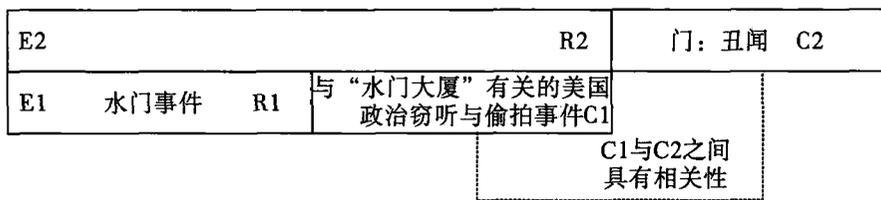


图6 转喻依赖相关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① 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82页。

② 乔纳森·比格内尔：《传媒符号学》，白冰、黄立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③ 曾庆香：《大众传播符号：幻想与巫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74~78页。

转喻参与构建含蓄意指的方式，在新闻文本“媒介化”“拟态化”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使用尤为频繁。费斯克曾说过：“所有新闻都是转喻的。”换言之，新闻事实虽只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局部”“片面”与“微观”，但自其被报道那一刻始，就被赋予了整个现实世界的“整体”“全面”与“宏观”属性。这种用“局部”去代替“整体”构建“真实”的能力，恰好就是转喻修辞所赋予的：“转喻之所以有能力传达现实，是因为它们用标志符号的方式运作。转喻就是它们所指代的事物的一部分……转喻常常被制作成自然的标志符号并因此被赋予‘真实’的地位而不受质疑。”^①

（三）反讽：反衬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隋岩在阐述隐喻与含蓄意指的等值对应时，将“反讽”理解为“隐喻”的一种特殊形态：“隐喻和含蓄意指都可以既是事物之间相似特质的想象性移植，也完全可以是事物之间相反特质的想象性移植，如反讽（irony）。”

反讽的修辞学定义，“是一个符号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意义，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这样的文本就有两层相反的意思：字面义/实际义，两者对立并存，其中之一是主要义，另一义是衬托义。但究竟两者中何为主要义，是依解释而变化，没有一定之规。”^②换言之，反讽主要依赖反衬性原则来构建其深层含义。因此，在单个符号内进行内涵建构的反讽并不常见，在符号组合（也即文本）之中往往才能更好表达反讽意味。

比如，获得第55届“荷赛奖”新闻人物类单幅二等奖的新闻照片——《纽约哈林区的示威者》就充满了反讽意味。就文本内层面来看，照片中所显示的警察逮捕示威者这一行为，刚好从反面映衬了作为示威抗议理由的“警察滥用职权”。如果再延伸到文本外层面，就不难发现，警察对游行示威者实施逮捕，一定程度上还讽刺了美国所宣称的自由主义中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内容。在这里，文本明示意是“示威者游行抗议有罪”，而隐含意却是“警察滥用职权可耻”。

^① 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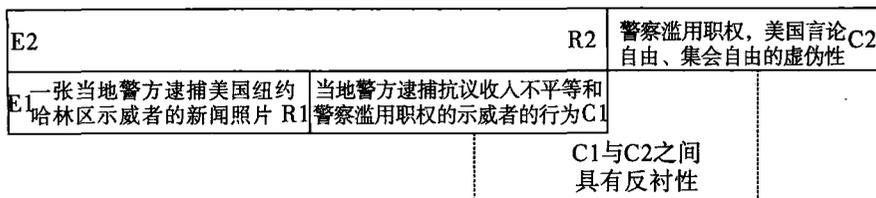


图7 反讽依赖反衬性原则构建含蓄意指

(四) 元语言：含蓄意指构建的内驱力

前文中笔者已经说明，隐喻、转喻和反讽都是含蓄意指构建意义的手段，那么，被隋岩称之为“与转喻对应合谋”的“元语言”，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元语言，被叶尔姆斯列夫描述为“一种操作程序”，被巴尔特描述为“说着”其对象语言的语言，是我们凭借“此一种语言系统（符号系统）”来解释或探究“彼一种语言系统（符号系统）”中的“此一种语言系统（符号系统）”。赵毅衡的解释相对更为直接：元语言，是一堆影响解释的符码的集合；而符码，是指“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的规则，控制解释时意义重建的规则”。符码是个别的，元语言是集合的，符号只有通过组成具有覆盖全域的元语言，才能通过元语言体系发挥作用。^①可见，作为一种操作程序，元语言主要用以解释作为内容的对象语言，用以对世界和社会进行解码。只有元语言的存在，整个文本和文本系列才具有“可翻译性”和“可解释性”。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所必不可少的。

由此观之，“元语言”绝非狭隘地等同于“转喻”，而是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含蓄意指的构建过程以及解释过程中，是含蓄意指得以构建的内在驱动力。原因在于：在含蓄意指构建的过程中，在直接意指所指 C1 与含蓄意指所指 C2 之间，无论是相似关系的建立，还是邻接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建立，再或者是反衬关系的建立，都有赖于元语言。换言之，含蓄意指在其建立过程中，总有一个隐而不见但却至关重要的元语言的调动和解释过程。正是元语言在背后发挥的解释作用，决定了符号解释的方向，使含蓄意指能通过相似关系（隐喻）、相关关系（转喻）或反衬关系（反讽）得以建立。

正如费斯克所言，“转喻不同于‘自然’的标志符号，比如烟代表火，而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是包含着高度的任意的选择。选择的任意性经常被掩饰或至少被忽视”^①，选择是具有一定“任意性”的，在一个相似关系、相关关系的建立中，哪一部分被选择了，哪一种品质被强化了，所体现的恰好是不同元语言的调动与参与解释。如，我们可以以“胖”为“美”，也可以以“瘦”为“美”，但是这两种意指既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元语言，也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元语言。当我们以“胖”来言“美”时，如唐代，背后的元语言可以是“胖”代表着富有、富贵，因为穷人一般缺乏充足的食物来维持胖的体形；当我们以“瘦”来言“美”时，如现今，在物质相对富裕的情况下，“胖”往往意味着贫穷、忙碌，没有足够的财力、时间与精力去健身。

四、象征：规约性使用实现内涵积累与神话建构

关于神话，巴尔特说，它由语言系统与神话系统两个不同层级的系统构成。位于语言系统中的，是能指与所指结合成的一个完整的符号，它“作为对象（工具、素材）的群体语言（language-object）”^②，作为神话系统得以构筑自身的材料和基石，充当了第二系统中的能指，并且在神话意指过程中被去语境、去真实和去内容后化为纯粹的、单一的、空洞的、抽象的形式，变成了工具性的能指。而神话系统中的语言是一种“释言之言”（meta-language，亦即元语言），它属于次生语言，是被用以谈论语言系统中的初生语言。在其将初生语言中充实的“意义”（sens，亦即初生系统的能指，“意义是已经完成了的，它设定了一种知识、一种过去和一种记忆，设定了事实、观念和规定的比较秩序”^③）转变成为次生系统的空洞的“形式”（forme，亦即神话的能指）的过程中，“意义”空洞化、贫瘠化、远离化，处于可掌控和可安排的境地。至于这个过程的目的为何，巴尔特解释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对“意义”进行扭曲和异化，为了更好地接受“概念”（concept，亦即神话的所指）中所含有的信息。因此，初生系统的“意义”与次生系统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意义”总是用来呈现“形式”，而形式总是用来疏远“意义”，但“意义”和“形式”之间绝对没有矛盾、冲突和分裂，它们只

① 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②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③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是从不居于同一处。^①

那么,是什么方式使得初生系统的“意义”能够顺利自如地转换为次生系统的“形式”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在符号文本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能够自然而然、毫无防备地接受这种转化为“形式”了的“意义”呢?在本文看来,在此过程中,除了需要比喻、转喻、反讽等修辞助力含蓄意指的构建之外,“象征”修辞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

关于象征,费斯克说,“当一个客体通过惯例而获得某种意义并用来表达一些事物时,它就成为一个象征”。赵毅衡也强调了象征的规约性与惯例性使用特征:所谓象征,是一种“二度修辞格”,是“比喻(包含隐喻、转喻、提喻等)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某种比喻在文化社群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生符用学变异而成”。^②换言之,正是社会性的反复使用,使得一组比喻能够积累足够的文化意义,进而使人们“一看到”或者“一听到”这个原本属于“理据性”的符号,便能“规约性”地指向其比喻意义的认知和理解。

如前所述,神话是在“涵指”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甚至是多次“再涵指”,是一种“二度意指化”,其目的在于要实现从有理据性的“意义”到无理据性的“形式”的转化。因此,如若没有象征修辞对这些“有理据性”的“意义”——含蓄意指进行大规模、重复性、规约性社会使用,来逐步实现其层层累积的意指,那么,“无理据性”的“形式”——神话便不可能得以构建。

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象征修辞对含蓄意指的大规模、重复性使用,并非是对含蓄意指中能指的单一使用,而通常是衍生出无数相似、相近、相关联的能指来综合使用。正如“人生如戏”这一母喻可以衍生出“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戴着不同的面具”“人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等众多子喻一样,神话在其构建过程中也有诸多能指可以听凭使用。如,在“黄岩岛事件”中,以《悉尼先驱晨报》《华盛顿邮报》《朝日新闻》《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国际媒体的系列新闻文本,分别用不同的符号隐喻来意指了该事件中的相关方:一用“中央王国”(today's Middle Kingdom)和“秀肌肉”(flexing its muscles)来隐喻和意指中国——试图向世界塑造一个崛起的,并且借助自身崛起而企图在地区中树立自己中心地位的中国形象;二用“美国的午餐”(America's lunch)、“美国在场”(American presence)来隐喻

^①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205页。

和意指美国，试图表明“中国正在吃掉美国在东南亚的午餐”。因此不管是出于对作为盟友国的菲律宾的友善，还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美国都需要在当地以军事驻扎的方式“在场”；三用“卒子”（pawns）来隐喻和意指菲律宾——一方面期望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企图将美国拉至前台，寻求保护；四用“爆发点”（flashpoint）与“试验场”（a major testing ground）来隐喻和意指整个中国南海地区，认为“黄岩岛事件是中国在试探美国、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获得多少资源”^①。正是这样的对含蓄意指及其所携带的内涵意义的反复使用，使一个“中国威胁”的神话正在被建构。

综上，与其按照巴尔特的原话“可以找到一千个拉丁句子来说明表语的配合，也可以找寻出一千张图片来证明法兰西的帝国性”来说，不如改换一下两者的顺序，更能准确地说明神话的建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千个拉丁句子的配合”和“一千张图片的证明”，“法兰西的帝国性”这一神话才得以建构。在这其中，“一千个拉丁句子”与“一千张图片”的大规模、重复性、规约性使用，便是神话构建过程中象征修辞的体现。

结 语

综上，在修辞手段如何助力符号意指的构建这一问题上，本文的观点是：第一，隐喻、转喻、反讽等修辞手段分别依赖相似性原则、相关性原则与反衬性原则参与了含蓄意指的内涵建构；第二，作为一种操作程序的元语言，并非如隋岩所言那样是一种对应于“转喻”的意指方式，而是所有含蓄意指得以构建的内在驱动力；第三，正是象征修辞对“有理据性”的“意义”——含蓄意指的大规模、重复性和规约性使用，使得“无理据性”的“形式”——神话得以构建、沉淀和升华。

作者简介：

李玮，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符号学。

^① 张军芳：《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载于《新闻界》，2012年第16期。